

别再让我们“节中凌乱”

■侯江

最近，网上一小段子得到了疯狂转发，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太强了：上三休三，上六休一，上二休七，上五休一。这里的“休”字没有八卦的意思，和最近风起云涌的名人离婚潮没什么关系，它实打实地就是休息的休。

相信很多人看明白了，这个段子说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安排。大家从本周一开始至10月12日长达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能够铭记这个小段子，对于免除“节中凌乱”是很有好处的。

真心感谢这个小段子的发明者，同时也感谢媒体提供的各式各样生动明了的日历和指南。没有这些方式，恐怕不少人真的记不清楚节日与工作日的无序变换。但同时，我们不禁也会产生巨大的疑惑，究竟为什么，过两个节放两个假，会让全国人民多半进入“混乱工作模式”？

其实真正的假期只有四天，分别是，9月19日的中秋节和10月1日至3日的国庆假期。另外的那6天假，是把好好的周末给生生

调整过来的。凑出一个三天、一个七天的两个假。让全国人民能够出行、消费、休整，当然是好事，但是，不能为了在这两个假期里的出行、消费和休整，就让全国人民小一个月不得消停。

早有人提议，国庆长假不变，中秋节前后的周末也别再凑数，中秋节那天休息就行。又或者，把中秋节那天的假期调整一下，与国庆长假加在一起放八天，不是也很好吗？

这件事情说浅挺浅，说深也深。放假，首先应该是真正为了全国人民休养生息，其次才是拉动内需等等。如果以凑天数、促消费为目的，导致全国性的“混乱工作模式”，那就真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了，那就真不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了。另外，若混乱的工作节奏真的导致某些同志出现了工作上的混乱，给国家造成损失，这过节放假也就放出了罪过了。

真心希望相关部门在研究下回放假时间的时候，能以简单、明确为宗旨，落实起来就是让人民群众在节日里得到放松的休息，而不是时时“节中凌乱”，时时担心自己记错时间，工作、休闲两耽误。

公司“打架”，不能拿游客当“利器”

■舒圣祥

海航旅业邮轮游艇管理有限公司的“海娜号”邮轮被韩国济州地方法院扣留。船上人员2309人，其中游客1659名，全部滞留船上。本次事件的起因是大新华轮船与江苏沙钢集团旗下沙钢船务之间发生经济纠纷。沙钢船务以法律纠纷为由，向济州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船舶。

明明是两家中国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结果却使2309名无辜游客和船员被作为人质扣押在异国他乡，这样的情节着实让人瞠目结舌。发生债务纠纷的是江苏沙钢集团旗下沙钢船务与海航集团旗下大新华轮船公司，后者欠前者5800万美元。而被扣押的“海娜号”邮轮并非大新华轮船公司名下资产，因此，韩国法院对非涉案船只乃至非涉案当事人旗下资产强行进行扣押，是否涉嫌违反国际公约，的确值得商榷。

此事最令人难以理解之处在于，沙钢为何会选择这样一艘载满游客的邮轮申请他国法院扣押？这难道不是要绑架2309名游客

和船员，作为自己讨债的“利器”吗？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吗？

两家企业打架，最后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却是无辜公众——像这种“公司打架消费者挨打”的事情，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如果说双方的纠纷是一场赌局，那么赌注都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作为第三者的公众利益。比如，某地供电公司把供水公司的电给停了，结果全城大停电。在类似事件中，打架企业都自我感觉良好，谁也不怕谁，受伤的公众，事后除了听到他们继续叫骂之外，甚至都得不到一声道歉。

公众利益屡屡成为被绑架的对象，这种现象不能肆无忌惮地继续下去。说到底，企业纠纷之所以一再拿无辜公众当人质，还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少见惩罚型赔偿——受伤公众不仅是无故挨打，而且是打了也白打。不得侵犯无辜的第三者利益，不以损害公众利益作为博弈筹码，这是任何企业互掐都必须坚守的市场正义底线；只要突破了这条底线，随意拿公众利益来陪绑，就应该被严惩不贷。

凭什么说菲尔普斯“站着说话不腰疼”

■刘雪松

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人说了句“年轻人做公务员是严重浪费”，被很多爱国人士讥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菲尔普斯在说“年轻人做公务员是严重浪费”之前，是有特定的语境的。他说，中国的很多工厂，“创新力还是零，没有什么新的”，“中国必须自己创新，这才能促发很大的生产力”。他同时告诫中国的决策者，“政府机构不是给年轻人的，这是低估了他们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费了社会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成本”。

菲尔普斯这番话，本意应该是想表达中国的未来设计师们，应该为年轻人更多地创造探索创新的动力和条件，包括劳动力的价值环境等，以激发年轻人投身科技创新，丝毫看不出有半点瞧不起中国青年的意思。但是，为什么到了一些旁观者眼里，却成了“指责年轻人太功利”？我看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盲目自尊，内心包容不了别人的“说三道四”；另一种是，假装糊涂、转移视线，回避国内的现实矛盾和困难。

从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到国考剑指公务员，虽然这其中有着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但中国的劳动力价值导向，客观上明显造成了公务员岗位的抢眼地位，因而明显地更加吸引年轻人往国家行政机关里奔跑。科技创新的道路，因为投资回报、扶持力度等现实状况，目前还难以吸引年轻人去大胆尝试，甘冒风险。

菲尔普斯举例说，“我们希望看到聪明的年轻人对妈妈说：妈，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开公司去了！”这句话，与其说是讲给中国的年轻人听的，不如说是道给决策者听的。我们不能一方面指责年轻人暮气沉沉，另一方面却不给年轻人活蹦乱跳的立志环境；不能一方面自己面对外部灵动的思想强调现实难题，另一方面却埋怨自己身边的年轻人不愿去改变现实。这种态度，恰恰是一种唯己是利的“功利和狭隘”。

探究中国年轻人为何渴望做公务员，不是菲尔普斯的份内事，而是中国人自己应该去担当的事。菲尔普斯只是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用国际的目光，将心比心地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在表达对于中国年轻人立志创新的勉励的同时，给中国的决策者，算了一笔现实与未来、投资与回报、成本与获利的国家经济账。

“妈，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开公司去了！”这些原本属于中国年轻人的浪漫想象、激情梦想，今天出现在一位白发苍苍的外国友人人口中，恰恰不是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了解中国，而正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

指责菲尔普斯“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一种凡是听到不爽观点，便习惯性地以“国情”说事的心理脆弱表现。

国情难免不同，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追求科技创新的激情，并以此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个规律，却不会因为国情不同而有丝毫区别。一个自己的思维都暮气沉沉的人，有什么理由指责现在的年轻人暮气沉沉呢？那才是真正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广告